

第二本书

Вторая книга
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俄)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著
陈 方 译

Вторая книга
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第二本书

〔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 著

陈 方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Вторая книга, изд.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1990

Copyright© Надежда Мандельштам, 1972, 1990, 199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本书/(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著;陈方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5

(文学纪念碑)

ISBN 978 - 7 - 5495 - 7935 - 8

I. ①第… II. ①娜… ②陈… III. ①曼德施塔姆, N. (1899 ~ 1980) - 回忆录 IV. ①K835. 1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9375 号

出品人:刘广汉

策划:魏东

责任编辑:魏东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44 字数: 560 千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中文版导读

凌 越*

一

《第二本书》是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回忆录只是一些零散文章的结集,还包括对曼德施塔姆部分诗作所作的批注,重要性远逊前两部)。第一部《回忆录》尽管在叙述时间上有闪回有追溯,总体而言是描述曼德施塔姆生命晚期两次被捕之间(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他们夫妻俩的遭遇。如果说第一部《回忆录》主要聚焦于曼德施塔姆的晚年,聚焦于这位诗人生涯中最苦难也最光辉的岁月的话,《第二本书》则将观察的视角降低,呈现出来的海平面随之下降,海水退得更远,沙滩变得愈益辽阔,而远处那些曾经隐藏于海水里的珊瑚和礁石也逐渐裸露出来——一个更广袤的时代文化场景在《第二本书》中登场。《第二本书》虽然没有第一部《回忆录》那种凝重的苦难,那种重击读者心灵的瞬间力度,但是前者的视野无疑更开阔一些,它开始更多地关注到曼德施塔姆同时代的那些

* 凌越,诗人,书评人。现居广州。

诗人和作家,尽管这种关注也是以曼德施塔姆为中心发散出去的。

同时,娜杰日达的主体意识在《第二本书》中开始苏醒,在书的第一节带有序言性质的《“我”》中,她说得明白:“写第一本书时,我把自己抛在了一旁,当时这是十分自然的,没有任何预先的构思,因为我当时根本不存在……创痛此刻如此巨大,我准备去写自己,写自己并且只写自己,但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会去讲述自己。现在我思考的并非是自己,而是我这一生积攒起来的零零碎碎的经验。”不过通览全书,你会发现曼德施塔姆仍旧处在全书的核心位置,只是这核心位置被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有关曼德施塔姆点点滴滴的回忆贯穿全书始终,这一点使两部回忆录融为一个整体,娜杰日达也以其无私的品格在复苏曼德施塔姆诗歌命运的同时,成就了自己作为杰出散文作家的地位。

自从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娜杰日达在基辅一家咖啡馆结识曼德施塔姆,直到一九三八年的五月之夜曼德施塔姆被秘密警察带走,夫妇俩几乎是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十九年。他们的关系从世俗的角度看并不平衡,娜杰日达是崇拜者,而曼德施塔姆居于夫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他们夫妇生活的核心就是作为丈夫的曼德施塔姆的文学创作。他们的生活一直比较拮据,很多时候只能以微薄的翻译稿酬为生,尽管如此,曼德施塔姆也不希望娜杰日达出外工作。他一直不惜余力地压制娜杰日达建设家庭的热望,压抑她身上那种觊觎他人成就的愿望。

在婚后,曼德施塔姆的创作方式主要是口授,妻子娜杰日达则是记录者,甚至有时负有为丈夫稍显凌乱的口授做整理的任务。“口授时,曼德施塔姆总是发牢骚,说我不能一下记住整首诗。他是一个要求很高的雇主,而且毫不感恩。”这种方式自然使娜杰日达对丈夫的作品非常熟悉,娜杰日达随口即可引用曼德施塔姆的诗句和散文片段,这一方面是因为娜杰日达有意凭记忆记下丈夫的作品以逃避审查,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创作方式本身使得娜杰日达能够将愿望予以实现。在写作回忆录之前,娜杰日达经过多年酝酿,思考

如何去写她的回忆录,在此期间,她又潜心阅读丈夫的所有作品,回忆他所有的见解和生活细节,她甚至重新阅读了对曼德施塔姆产生影响的那些书籍——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伊万诺夫、弗洛连斯基、柏格森等等。

对丈夫的崇拜使娜杰日达完全接受了他的文学和诗学观念,那些杰出的诗句渐渐潜入娜杰日达内心深处,和她自己的意识和个性混合在一起,形成具有鲜明自身风格的文风。这种文风将对语言的敏感和娜杰日达自身的直率个性熔为一炉,它造就了两本杰出的散文,但又和曼德施塔姆偏于复杂、缠绕美感的文风并不雷同。对此,布罗茨基在为娜杰日达所作的悼文中有过论述:“无论就内容还是风格而言,她的书实质上都只是一种崇高的语言形式之附言,这种崇高的语言形式就是诗歌,仰仗对丈夫诗句的反复背诵,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使这种语言形式成了自己的肉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娜杰日达的回忆录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所揭示的极权统治下诗人的悲惨命运,除了它作为一份时代证词的作用之外,那来源于优秀诗歌滋养的干练又迷人的文风则确保它自己独立地成为杰作。

二

作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化生活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娜杰日达在《第二本书》中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一手材料,涉及多位和曼德施塔姆同时代的重要诗人,而且因为娜杰日达坦诚直率的个性,这些描述和分析——和第一本《回忆录》一样,《第二本书》中的分析和评论也占据相当篇幅,且常有洞见——具有相当大的可信度和深度。比如在《三诗人》这一节中,娜杰日达论述了同属于阿克梅派的三位诗人——曼德施塔姆、阿赫马托娃和古米廖夫。娜杰日达特别提到:“阿赫马托娃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一直回忆阿克梅派的青年时代,她总是忧心忡忡,怕未来的文学理论家们把阿克梅派列入‘年轻一代象征

派’，或是把曼德施塔姆从中分离出来跟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随着第一部《回忆录》在纽约的出版，以及曼德施塔姆诗歌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娜杰日达最担心的曼德施塔姆完全被遗忘的命运应该说已经避免。

因此在《第二本书》中，娜杰日达可以较为从容地讨论更精细的文学史问题，探讨阿克梅派和象征派、未来派的关系。在苏联主流文学史中，主要因为未来派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形态采取接受和拥抱的态度，人们普遍更重视未来派，把它当作一个名副其实的革新流派，阿克梅派则被当作象征派的复制品，是一棵粗壮大树上的小枝丫。但在娜杰日达看来，这种看法显然小觑了阿克梅派，她敏锐地指出“阿克梅派并不是一个纯文学的结盟，而主要是一个世界观联盟”。在对待基督教问题上，阿克梅派也迥异于象征派通常对于基督教的反叛立场，“古米廖夫和阿赫马托娃笔下的是传统的教会基督教。而曼德施塔姆的基督教是他理解世界的基础，与其说它具有日常性质，不如说它是哲学层面上的”。这些见解都颇具深度，而且更多来自娜杰日达自己的观察和判断。

在随后的章节中，娜杰日达还论及纳尔布特和津克维奇等较次要的阿克梅派诗人，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曼德施塔姆和另外几位白银时代重要诗人的关系显然更加吸引眼球。赫列勃尼科夫是白银时代公认的大诗人，可是因为过早离世以及作品本身的实验性，他大概是惟一没有被中文世界充分重视的白银时代大诗人，迄今还没有一本中文译诗集。甚至因为其特立独行的个性，白银时代诸多作家的回忆录中也鲜少见到他的身影。在《第二本书》中我们欣喜地发现有一个章节正是关于赫列勃尼科夫的，虽然娜杰日达见到他时已经是这位诗人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娜杰日达无缘得见两位大诗人早年交往的经过，她是在一九二二年曼德施塔姆和赫列勃尼科夫在莫斯科街头邂逅之后，才认识了后者。作为浪迹天涯的诗人赫列勃尼科夫抱怨他在莫斯科无所适从，无以果腹——显然，他已陷入绝境。这个时候，曼德施塔姆显出令

人感动的善良天性，“对赫列勃尼科夫照顾有加，远比对女人们要好，他对女人们总是谐谑而又稍显粗鲁的样子”。曼德施塔姆夫妇当时拿的是二等配给，也就是每月一次，“有人给我们的小口袋里装上粮食、面粉和白糖，慷慨地分给我们一块黄油和一只冻猪头”。尽管如此，他们邀请赫列勃尼科夫每天中午来他们的住处一起共进午餐。

赫列勃尼科夫当时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糟糕，与他交流变得异常困难。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虽然嘴唇在不停地蠕动。赫列勃尼科夫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根本听不见任何问题，只是对十分具体的诸如“再吃一点吗”的问题以点头作答。娜杰日达比较了曼德施塔姆和赫列勃尼科夫迥异的性格：“前者动感十足，消瘦，快乐，爱说话，对每一缕微风都会做出反应，而后者内敛，封闭，沉默，以点头代替说话，不停地在脑中摆弄富有韵律的诗句。”但这并不妨碍曼德施塔姆对赫列勃尼科夫的激赏，在娜杰日达看来她的丈夫对任何人都不像对赫列勃尼科夫那么爱护和关心。为了给赫列勃尼科夫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曼德施塔姆拉着他去找当时的作协主席别尔嘉耶夫，用尽犹太人个性中全部力量对这位官员发起猛攻，要求他分给赫列勃尼科夫一个房间，理由是：赫列勃尼科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整个世界诗歌在他面前都显得黯然无光，因此他配得到一个房间，哪怕只有六平方米。也许为了现实诉求的实现，曼德施塔姆有点夸大了，但是他对赫列勃尼科夫诗歌的欣赏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和大多数文艺官僚一样，他们总能犀利地将杰出作家拒之门外，曼德施塔姆倾尽全力的最后努力没有成功，赫列勃尼科夫直接从莫斯科被抛入最后的旅途。过了不久，赫列勃尼科夫在一个荒凉地方去世的消息传开了，死前他没有得到过任何专业医疗救助。也许是受到丈夫的影响，也许是赫列勃尼科夫本身的悲剧性命运感动了娜杰日达，这整个一章的调子是哀婉和怜惜的，“这怜惜如此强烈，以至于它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

在论及白银时代另外两位大诗人——阿赫马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时，娜杰日达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应该说也暴露出她的某种局限性，甚至于这局限性

使整本书的品格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布罗茨基为娜杰日达撰写的悼文末尾也委婉提及这一点,说她如果缺少点什么,那就是宽容。“她是偏执的,决绝的,挑剔的,不愿妥协的,毫不宽容的。有时,她的观点是不尽完善的,或是以传闻为基础。”阿赫马托娃是曼德施塔姆夫妇的密友,或者按娜杰日达自己的话说,正是因为娜杰日达的出现使他俩的友谊恢复了活力。在曼德施塔姆被捕后,阿赫马托娃是最早来探望娜杰日达的人,并在被夜间搜查弄得一片狼藉的房间里安慰她。而在二战时,也是阿赫马托娃想尽办法将娜杰日达带到后方塔什干,并用自己的一份口粮养活了两个人,否则很难想象娜杰日达可以度过艰难的战争岁月。在《初识》这一节,娜杰日达自己也坦承:“在塔什干时我自己确实是靠阿赫马托娃活下来的。我们分开住的时候,她总是从自己的餐桌上给我省下一块面包或者一小把通心粉,之后我们搬到了一起,我们就靠她的配给过日子。”在这个意义上,阿赫马托娃称得上是娜杰日达的救命恩人。

在第一部《回忆录》中,涉及阿赫马托娃的部分多半是充满温情的,符合友谊的命名。可是事隔十年之后,阿赫马托娃离世也已四年,当娜杰日达开始写作《第二本书》时,她提及阿赫马托娃的笔触却变得明显苛刻。比如她说阿赫马托娃日后势必会结集的译文集中,后者自己翻译的内容不超过十行,其余都是随便什么人帮忙翻译的,而稿费对半分。娜杰日达自己也说恐怕不会有人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可是她为什么要写在自己的书里呢?阿赫马托娃真的出于生计考虑以自己的名义领取较高的翻译稿酬,然后再把活转包给他人吗?这些都是难以确定的事。至少这种揭露本身不像是朋友干的。

在提及阿赫马托娃的散文作品《日记散页》时,娜杰日达特别在旁边的括弧里补充说明:“顺便说一句,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日记。”在另一处,娜杰日达又借他人之口,说阿赫马托娃疏于妆扮,不会穿衣服,不会好好梳头,一句话,她只不过是粗俗不堪的女人。娜杰日达也将这种攻击直斥为“狂躁的憎恨”,可是有必要将这种莫须有的攻击列举出来吗?这种苛刻中显然混有

某种醋意,娜杰日达甚至直率地问过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有没有求她和自己睡觉,或者曼德施塔姆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当她听曼德施塔姆讽刺阿赫马托娃觉得所有人都爱恋自己时,娜杰日达笔触中显然有种难以掩饰的快意。但是谁能否认曼德施塔姆这样说不是为了取悦甚至安抚自己妻子呢?通读全书,很难想象最初这是一本以完成女友的遗愿着意写阿赫马托娃的书。不仅仅是因为娜杰日达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回忆起自己的生活,不断回忆起和曼德施塔姆在一起的时光——偏离最初动机的写作其实并不罕见。问题是提及阿赫马托娃时那种苛刻的带有怨气的语调,我们不清楚在写作两本回忆录之间,娜杰日达和阿赫马托娃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书中似乎也很难找到那种令友谊退化的决定性事件,但是娜杰日达对阿赫马托娃的态度在写作两本回忆录之间的岁月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茨维塔耶娃,娜杰日达反倒显得宽容公允一些。在《老友》一节中,娜杰日达回忆了和茨维塔耶娃的初次见面。那是一九二二年夏天的莫斯科,娜杰日达随曼德施塔姆去拜访住在厨师街一个小胡同里的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开门见到曼德施塔姆时惊呼了一声,但和娜杰日达握手时却很勉强,眼睛也只顾看着曼德施塔姆。随后,茨维塔耶娃邀请曼德施塔姆去看女儿阿利娅,却对娜杰日达说:“那您在这儿等等吧,阿利娅受不了陌生人。”通过这样的描述,不难感受到茨维塔耶娃对娜杰日达的轻视甚或敌意,作为丈夫的曼德施塔姆自然尴尬非常,很快就带着娜杰日达离开了。和阿赫马托娃不同,曼德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之间发生过短暂却炽热的恋情,他们彼此之间互赠过多首热烈又美妙的爱情诗,茨维塔耶娃写给曼德施塔姆的有《疯狂——也就是理智》、《哪里来的这般温柔》、《你把头向后仰起》,曼德施塔姆写给茨维塔耶娃的则有《在堆满麦秸的无座雪橇上》、《在不协调的少女合唱声中……》、《不相信复活的奇迹》。而作为《醋意的尝试》的作者,茨维塔耶娃对故友以及他们的妻子们显然持一种蔑视的态度,这些作为一种前提都被娜杰日达接受了下来,这使她对茨维塔耶娃明显的轻慢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那是她们惟一的见面,娜杰日达对茨维塔耶娃的印象并不坏:“她绝对天然,不加雕琢,她的任性让人感到震惊。我记住了她的短发,几乎像男孩子一样轻松的步态,还有她如诗一般的声音。她个性十足,但这不仅是她的性格特征,更是她的生活宗旨。”娜杰日达甚至坦言很遗憾没有和茨维塔耶娃交朋友,也许从她那里可以“让我学会她的那种义无反顾和奋不顾身”。在这一节末尾,娜杰日达提起阿赫马托娃讲过的和茨维塔耶娃在塔什干的惟一一次见面。当时的茨维塔耶娃已经心力交瘁,丈夫埃夫隆和女儿阿利娅都在狱中生死未卜,儿子也正值青春期的根本不听她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正酣,生灵正遭涂炭。茨维塔耶娃向阿赫马托娃抱怨自己的命运,满怀悲戚,突然她说去看过童年时代的房屋,院子里的椴树还和从前一样茁壮成长。她请求阿赫马托娃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否则“他们知道了就会砍掉它”。娜杰日达之后的评论饱含同情:“我不知道还有谁的命运比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更加可怕。”

虽然《第二本书》不少篇幅纠缠于复杂的人际关系,被人和人之间的恩怨分散了批判的锋芒,总的质量要稍逊于第一部《回忆录》,但在描写和曼德施塔姆同时代的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赫列勃尼科夫、茨维塔耶娃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时候,娜杰日达到底以辛辣又同情的笔触勾勒出苏联极权统治下诗人们的悲惨命运。在此意义上,《第二本书》和第一部《回忆录》一样,当得起布罗茨基的赞誉:“在人间对她所处的世纪和她所处的文学作出的最后的审判。”

三

占据《第二本书》核心位置的仍然是娜杰日达的“奥夏”,是她的曼德施塔姆。她一说起曼德施塔姆就滔滔不绝,似乎有语言的千军万马席卷着她裹

挟着她。娜杰日达回忆和曼德施塔姆共同生活的十九年里点点滴滴的细节，回忆曼德施塔姆说过的话，记述曼德施塔姆每一个微妙的思想，在整部书中娜杰日达信手拈来地引用曼德施塔姆大量诗文，对其熟悉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又令人感动。这一切都符合爱情那让人绝望的特征——可望而不可求。是曼德施塔姆因极权迫害过早离世客观上造就了这种情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极权对于娜杰日达的穷追不舍（作为所谓人民公敌的妻子，她被勒令只能居住在离莫斯科一百俄里以外的偏僻小镇），使她除了丈夫的诗句和对丈夫的记忆之外几乎一无所有。一九三八年曼德施塔姆在远东的劳改营被迫害死亡以后，随后四十多年的余生中，娜杰日达完全活在对曼德施塔姆的追忆之中，她立志要让曼德施塔姆那些美妙的随时处于被覆没状态的诗句得以留存得以永生，同时这追忆也给她自己的生命提供了动力之源。这是一位多么柔弱的女人，可这又是一位多么勇敢、坚强和倔强的女人啊！

正因为这坚强的记忆，当娜杰日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着手写作她的回忆录时，往日的印象、记忆和诗文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而出，这语言里有喜悦有哀伤有愤懑有精彩的分析论证，一句话，这语言里包含了这个女人的一切——她全部的肉体和精神。如果说当她写作白银时代其他诗人时，是出于一种为时代立言的外部动机，而当她写到曼德施塔姆时，那就是一种本能，仿佛是在书写她自己的生命，因为她和曼德施塔姆是一体的。她写到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和曼德施塔姆在基辅“废物”咖啡馆的首次相遇，“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不假思索地走到了一起”。在那个欢快地聚集着画家、诗人、演员和音乐家的咖啡馆，娜杰日达如何知道怎样一个可怖的命运在远处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两人的结合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娜杰日达自己也认为能和曼德施塔姆相处两周就不错了，只要“不伤心”就好。两人的朋友对他们的关系也多半并不看好，有人认为娜杰日达太过年轻，而爱伦堡则认为曼德施塔姆作为伴侣并不靠谱。在经过最初的热恋之后，毫不奇怪地和所有的爱侣一样两人也时常发生争吵，因为一些无谓之事。曼德施塔姆有一种控制欲，“想让我

跟他争吵,为他争风吃醋,跟他大吵大嚷,大声喊叫”。

有那么一回,娜杰日达愤怒至极,说出那句神圣的“是我还是她”,曼德施塔姆突然激动万分:“终于,你终于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了!”这里的她是指奥尔迦·瓦克谢里,曼德施塔姆生命里另一个重要的女人,也是他在婚姻内最严重的一次出轨。在奥尔迦还是小姑娘时,曼德施塔姆就认识她,一九二五年一月中旬,他们在街头邂逅,自此奥尔迦每天都到曼德施塔姆夫妇的家,一边无所顾忌地亲吻娜杰日达,一边把曼德施塔姆带走。夫妇俩的婚姻关系岌岌可危,只是在最后当娜杰日达决意和另一个男人出走时,曼德施塔姆才幡然醒悟,结束了这段火热的关系。这些都真实地记录在《临界状态》这一节中,在见到很多老头逃离自己年老的妻子之后,有一次娜杰日达问阿赫马托娃,如果曼德施塔姆健在会抛弃她吗?阿赫马托娃肯定地说:“毫无疑问。”娜杰日达和曼德施塔姆之间无疑有着伟大的爱情,但娜杰日达自己其实很清楚,这伟大的爱情部分是随着她苦难的孀居生活,随着她执著的回忆愈益繁茂起来的。她用两本杰出的回忆录,用文字那结实的绳索将曼德施塔姆和自己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的关系如此牢固,足以抵挡时间之河永恒的冲刷。而周围的生存环境愈是险恶,也愈是映衬出这爱情的伟大(“我们在一起十分美好,这也许就是因为生活永远都处在死亡和终结的门口”),反过来这伟大的爱情也映衬出极权之恶的疯狂。因此,布罗茨基才会在那篇著名的悼文里意味深长地写道:“她是文化的遗孀。我认为,她在生命的最终比刚结婚时更爱自己的丈夫。”

四

对娜杰日达来说,在险恶的时代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保存曼德施塔姆写下的那些诗歌的珍宝,而她的回忆录则是在诗歌之外复活一个诗人的生命和灵

魂,在这种复活里综合地体现着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鞭笞。她深知“恶的惯性无比强大,相比之下,善的力量无助而又被动”,因此她用全部的生命来为这柔弱的善做后援,她主要刻画了曼德施塔姆悲剧性的命运,同时兼及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赫列勃尼科夫等一众白银时代杰出诗人所经受的煎熬和苦难。除此以外,在《第二本书》里娜杰日达也有意识地将笔触从诗人圈延伸到社会,当然诗人的生活不是孤岛,只要忠实描写这些诗人的生活,这种触及也是迟早的事。在全书靠前的《灾害》一节,娜杰日达和曼德施塔姆刚认识不久,当时的基辅正是红军、白军绞杀的前线,他们通过窗子看到整整一马车衣冠不整的尸体,那是布尔什维克撤离前在最后一刻射杀的人质,“那些尸体上敷衍地遮着草席,死者的四肢从四面八方垂了下来”。而当白军进驻基辅之后,曼德施塔姆夫妇又从另一扇面朝市杜马的窗户,看到一群白军抓住几个红褐色头发的妇女,把她们几乎扯成了碎片,人群大声吼叫,说那些妇女是肃反分子罗莎。街上到处是尸体,那是兽性大发的苏联国内战争,而白银时代诸诗人的悲剧命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上演的,惨烈的时代背景衬托着诗人个体的悲剧,竟是如此耀眼。

在《浪子》一节里,娜杰日达又记下了乌克兰人民的悲惨生活。一九三〇年五月到十一月曼德施塔姆夫妇在亚美尼亚和梯弗里斯生活,就在那里曼德施塔姆在长久的诗歌创作枯竭期之后重新找到灵感,组诗《亚美尼亚》即是此行的产物。布罗茨基说得没错,作为诗人,曼德施塔姆仅动用了他全部经验的十分之一,其他的十分之九则要由娜杰日达来填补。在回忆录里,娜杰日达记下小城梯弗里斯的状况:遍布乌克兰的逃亡者和流浪汉,三十年代初,乌克兰因没收富农财产运动和集体化发生不可思议的农民饥荒,其规模和可怕程度堪比二十年代初伏尔加河流域的大饥荒。而在城市周边则出现一些地窖,里面寄居着被迫离开自己土地的农民的儿女们。其惨状令人不忍目睹,在回忆录里娜杰日达记下自己亲眼所见的这些惨状,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这部分内容虽然只占据全书较小的篇幅,但是无疑加大了对极权控诉

的力度。极权之恶摧毁了俄罗斯几代人的命运(“好几代人的水都搅浑了,已经无法开辟出通向纯净源头的小路了”),而诗人们只是沧海一粟,只是作为种族的触手(庞德语),他们的诗句和命运被托举出人群,成为控诉极权的有力证词。

在《浪子》这一节的第八小节《局外人》中,娜杰日达尝试分析了造成曼德施塔姆悲剧命运的原因:一种和革命时代逆向而行的单纯的天性,在时代暴戾力量碾压之下的必然陨灭。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曼德施塔姆首次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疏离感一方面来自文学圈,曼德施塔姆在很多圈子里都是一个异类,阿克梅派原本就是那个年代苏联文坛上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里的异类,曼德施塔姆欣赏并感到亲近的人并不多,除了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之外,大概可以算上未来主义里的赫列勃尼科夫和马雅可夫斯基。另一方面,曼德施塔姆天性单纯,信任人,尊敬所有人,除了“词语的敌人”,善于享受生活给予的一切,而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革命年代如同自然灾害一般突然降临,它首先强化了当下感,每个人都做好了意外死去的准备。”街头血流成河,每个人都看到过死人和马路、人行道上被射杀的人。暴戾的时代气氛养育了杀手和野兽,一种貌似正统却凶残的观念被戮力灌输——为了人类幸福的远景,不仅可以杀人,而且必须杀人。而一个诗人如果固守自己善良单纯的天性,固守缪斯的重托,他和整个时代的碰撞就是迟早的事,而谁会是利维坦的对手呢?因此,曼德施塔姆作为诗人的悲剧命运甚至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确定。他越是忠实于词语忠实于缪斯,就越是和那个疯狂的年代格格不入,“他不愿意在观众面前起劲表演,更不想认识他们。他特立独行,诗里写的是他控制不住、喷薄而出的那些内容”,也就是他真正想说的未经虚饰的话。

五

对于这本回忆录的意义之所在,娜杰日达有着自己的阐释,在《第二本书》的尾声《沉默的岁月》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读来令人动容:

我此刻即将完成的这本书可能会消失。没有什么比毁掉一本书更容易的了,只要它没在地下出版社传播开来,没在印刷厂印出来,就像在俄罗斯历史的古腾堡时期那样。但是即使一本书粉身碎骨,它也不会彻底消失。那些销毁手稿、词语和思想的专家把书投进炉子之前会读到它的。他们什么都看不明白,但在他们古怪的头脑中终究会留下一个印象,他们知道有一个不正常的老妪无所畏惧,蔑视权力。就让他们哪怕了解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悲怆的语调里有一种从容和坦然。对于娜杰日达来说,第一部回忆录显然更为重要,曼德施塔姆诗歌的留存,作为诗人避免覆没的命运始终是她心之所系。当她写作《第二本书》时,第一部《回忆录》已经于一九七〇年由纽约契诃夫出版社首版,并迅速被译成欧美多种语言,不断再版。随着这本书的出版,曼德施塔姆重新赢得世人的重视,娜杰日达一直悬在心头的担忧总算是放了下来。在娜杰日达看来,只要曼德施塔姆避免被扼杀被覆没的命运,他的作品就会成长为文学史里的参天大树,正如娜杰日达自己在《第二本书》开首所说:“自曼德施塔姆最后一部作品问世以来,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九部作品集的总印数不超过三万册,可是比起作品湮没图书市场的那些畅销书作者而言,他的存在完全处在更高层次上。”

而对聚焦相对模糊的《第二本书》,娜杰日达坦然得多,也就是说她其实

完全不在乎自己作为作家的地位,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无私,在为她赢得可以想象的尊重的同时,也提升了她的回忆录的品质。众所周知,在文学作品中,“无我”是极高的近乎难以企及的状态和品格,它可以使作家完全沉浸在对客观物的观察中,不被自我的幻象所干扰(客观地说,这一点第一部《回忆录》做得更好)。那么,这种无私从何而来?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爱。因此我们也可以笼统地说,娜杰日达的这两部回忆录是有关爱的杰作,这爱由对曼德施塔姆的个人之爱升华而来,并浸润了整个人世和世界,获得了更为恢弘的气度,在那里美妙的词语和善达成了紧密的联盟,曾经充斥人世的恶则无地自容、无所遁逃。

《第二本书》以《最后一封信》这一节作结,这是一封未曾送达收信人的信,它写在两张破烂不堪的纸上,写信时间是一九三八年十月,那个时刻距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有五个月时间,又过了两个月,娜杰日达得到曼德施塔姆的死讯。信被扔进装满纸片的箱子里,在里面安静地待了三十年,在某次整理曼德施塔姆遗稿时被娜杰日达重新发现。这是一封感人至深的情书,我不记得是否看过比这更感人的信,作为这部爱之书的结尾,我以为这封信是这本书最完美的句号。在此我引用这封信的开头和结尾的部分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其余的请读者你们自己去书中寻找,我以为只有读完全书,才配看这封短短的信:

亲爱的奥夏,我遥远的朋友!我心爱的人,我不知该写些什么,你或许永远都读不到这封信。我把它写给空间。也许你会回来,而那时我已经不在了。那么这就是我最后的记忆。

奥休沙,我们孩子般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啊!我们的争执和吵闹,我们一起玩的游戏和我们的爱情。我现在甚至不抬头看天了。如果我看见一朵乌云,我该把它指给谁看呢?